



# 王凤连



## 怀念众志成城的岁月

1956年的一天，王凤连去北京协和医学院上班时，突然接到通知，她要调工作了。有着优秀独立工作能力，兼具临床医学与微生物免疫学背景的王凤连，服从选调命令，二话不说来到了位于黑山扈的解放军胸科医院。

1958年，解放军胸科医院归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阜外医院成立。吴英恺“命令”她：“王凤连，你可哪也别去！从研究结核病里跳出来，跳到心脏病去。”王凤连遂率领整个团队跟上医院转向步伐。

历经过帝国主义侵略、军阀混战、解放战争、“文革”的磨砺，王凤连这位与祖国共患难的老人，至今仍十分怀念建院当时激情燃烧的岁月，怀念当时的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。

## 我是一棵小树

至今王凤连也不明白，当时解放军胸科医院建院时，院长吴英恺究竟是如何找到她的。

1956年，为了战时及和平年代的需要，总后卫生部决心建设国内第一所胸科医院。组织上选定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教授吴英恺任命为院长，负责组建。

吴英恺从自己的老东家“挖”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包括王凤连在内的18位青壮年协同自己建院。后来，这18人被誉为建院的“18棵青松”。

回想起自己被通知调走的情形，王凤连用“突然”两个字形容。

“没有谈话，就是一天上班，科主任直接告诉我，我要调动工作了。什么时候，汽车在哪个门等都安排好了。”王凤连回想起临走前的那一幕，吴英恺、蔡如升、朱贵卿3位教授已等在门口，大家同坐一个面包车就被从城里拉到了黑山扈。

对于这突然的选调，王凤连既不舍又平静。

不舍得是，从实习到留校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她已经在国内最高医学学府待了8年，从一名稚嫩的医学生成长为导师谢少文教授的得力干将，北京协和医院设备较完善，人员充足，事业也正蒸蒸日上，王凤连在结核菌方面的研究已经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。一位进修生曾说：“看见王凤连发表的论文，还以为是一个戴着黑边眼镜的老先生，谁知一见面，



1950年，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

竟是一位小姑娘。”

不过，平静的是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，“我上学干什么？上学不就是为国家服务吗？现在国家建设需要我，我就应该去。胸科医院是我们自己部队的医院，急需人才的呀！”

没有与国家一起经历过苦难的人，也许很难理解这样的情愫。

1937年，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时，王凤连正在读小学，年幼的她目睹了日军枪管下民不聊生的苦难，一大家子人多数被迫转到后方。1946年，国民党发动内战，王凤连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，见识了特务们夜里抓人，对进步青年的毒打。1949年早春，王凤连从老家——蒋管区青岛回解放区北平，需要化装成“村妇”、携带“良民证”，夜闯两区交界地带时，被土匪抢劫，而一到解放区，迎接她的是解放军战士，并让到准备好的火堆前取暖、还端上了洗脸水和马头牌擦脸油，洗去了满脸的尘土……

因此，对共产党她是由衷地信仰，对新中国，她是热切地渴望强大！而眼下，在她看来，胸科医院的建设正是祖国的召唤！

就这样，有着优秀独立工作能力，兼具临床医学与微生物免疫学背景的王凤连，服从选调命令，二话不说来到了胸科医院。

多年后，回想这次职业生涯转折，王凤连说：“我是一棵小树，栽到哪里哪里长。”

## 创造条件办医院

解放军胸科医院前身原是解放军122疗养院。吴英恺率领18位青壮年进驻时，原单位留下了120余位医护人员。这些人后全部被招至胸科医院麾下。

一座法式老楼、一座现代化“飞机”式样新楼、140余位员工、一些简单的遗留设备，这是胸科医院开创伊始时的全部家底。

吴英恺雄心勃勃地为这所医院立下了“天下少有，中国第一”专科医院的目标，他誓把医院建成既有临床又有基础研究的医院。

然而，现实却是缺人、缺设备！

回想起医院建设初的经历，王凤连仍十分怀念那种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、速战速决的工作作风。

在扩充人才方面，根据专业需求，吴英恺撰写报告从军队、地方医学院校选调优秀人才。军委直接发电报命令，连个调函都没有，被选调人接到命令后当日就会乘车、乘飞机到本院报到，连行李都不拿。接到任务后，再回去搬家。这些人多来自军医大学，虽然属于优秀人才，但为医院所用，仍需各科室负责人悉心培养。就这样，王凤连所在的细菌免疫室调来了1名助教、10余名技术员，后又来了几批进修生。

人的问题解决了，但设备却成了问题，那时，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，生活物资都很贫乏，医疗设备的境况就更加难以想象了。

“当时买东西可不像现在，学术会议上，外企给设备，‘你们先用，用好了再给钱。’那个时候，可真是什么都买不着。”王凤连回忆，这应该是创业时最大的困难了。

当时，北京虽是文化城，但仪器制作不如上海，在国有经济呈压倒性优势的大背景下，上海已经开始出现



1956年，王凤连在解放军胸科医院楼前

一些公私合营的工厂，而与公家工厂相比，这些工厂设备生产能力相对较强。遂吴英恺指示副院长蔡如升带领王凤连、徐守春、张琪到上海采购。四人带着各科室申请报批的器材、型号规格单就出发了。

从北京到上海，要过长江，而那时的长江没有桥，火车也是先要一段一段地用轮渡过江后再接上。四人对上海人生地不熟，单凭自己，买上可心的设备难上加难。

谁知，四人刚下火车，就听见火车站高音喇叭播出：“请以蔡如升副院长为首的采购团出站时看接站人手中举的大牌子。”一听到这，四人感到心里踏实多了。原来前来接他们的是总后卫生部驻上海办事处的几名干部，是总后卫生部安排好的。宫部长曾说：“建这所新型的胸科医院，总后卫生部一定大力支持。”

更让四人觉得贴心的是，采购器材时，办事处人员和第二军医大学器材处的专业内行人员陪同。只要一把计划购置的清单拿出，就有专门人员帮助采购。市场上若缺货的，就定做。有时，工厂负责人说，订货已经安排到年底了，但只要听说是支援部队医院建设，就会插进去提前做。王凤连所需要的蔡氏滤菌器，需要用银子做，工厂没有。工人提议他们到银行申请银圆，没想到，拿着申请，银行很快就批了。

该买的都选定后，购置清单留在了第二军医大学。他们帮着验收是否合格，并帮忙邮寄。很快，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所需的设备都到齐了。

在购置设备的这件事上，虽然涉及了一个系统的3个单位，系统外的工厂和银行，但只要是提到国家军队建设，都会迅速反应给予支持。

王凤连感慨：“当时办事情真好办，办事效率很高。”

## 不分白天黑夜

在胸科医院，细菌免疫室的主要任务是科研。王凤连介绍，与如今科研

选题的申请经费不同，那时选题纯粹为了医院临床需要。说到此，王凤连十分佩服吴英恺的智慧，坦言“他在学术管理上，很有办法”。

那时，胸科医院远离城区，很是孤立。谁能为各科室的科研选题把关呢？吴英恺想到了老东家——北京协和医学院。然而，毕竟北京协和医学院与胸科医院是相互独立的单位，一个地方、一个军队，行政上没有任何关系。

吴英恺就动用各种关系做工作，将“18位青松”的老师及著名专家们都请来，成立医院学术委员会，这些委员个个都是“大拿”。到各科开题报告时分，就请这些“诸葛亮”利用周末到黑山扈来指导，并顺便欣赏郊外风景。解放军胸科医院背靠望儿山，前拥京密运河，院子里满是葡萄，秋天更是满山红叶，风景美不胜收。赏玩之余，学术委员会就要充当“法官”，针对各科选题进行全方位审查，保证科研课题的临床导向性、创新性和可行性。

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下，王凤连完成了“对链霉素、异烟肼敏感及耐药结核菌对豚鼠及地鼠的致病性”“结核病红细胞凝集反应的诊断效价测定”等研究，相关结果发表在《中华结核病杂志》等期刊。其中，325例肺结核瘤肺切除瘤内及支气管残端结核菌分离、病理观察综合研究总结由院长吴英恺

带到了在苏联召开的胸外科学术会议做国际交流，受到了关注。

在培养人的方面，为了在科研中做到“抬头看路，不做无效研究”。王凤连借鉴协和老



1958年，王凤连在实验室做细菌移种



1960年，王凤连（中排右5）与阜外医院检验科合影

师谢少文的教学方法，带领着科室人员学外语，读国内外文献。

科内技术员金律的学习态度给王凤连留下深刻印象。初中没毕业的金律就参军上战场，部队选送他到技术学校培养，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。1956年调来本院，操作技术比较全面，但英文水平较差。王凤连利用晚上带他们学英文。开始时用1个小时他查着字典才能读完两行英文文章。但是凭着这样过人的好学态度和坚韧的毅力，后来能顺利阅读外文文献，独立建立新研究方法和发表论文，最后提升为主任技师，这在级别提升十分困难的技术员系统，非常难得。谈到这时，王凤连一脸的自豪。

那时候，胸科医院施行“封闭式”管理，员工周一至周五24小时住在医院，工作不分白天黑夜，周六晚才能回家，但周日下午4点前必须返回医院开生活会。有的人心里不高兴，埋怨：“都是8小时工作制，哪有24小时在院制？”

后来因为大家待人接物都非常开诚布公，院风、同事关系很好，慢慢地也就习惯了。

## 大家不争这个

1957年，卫生部对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大调整，将北京协和医学院改组成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，并成立中国医学科学院。1958年，总后卫生部与卫生部协议，将胸科医院转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，迁址到阜成门外，胸科医院正式更名为——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阜外医院。

招牌的改变，也带来了业务方向的转变。从全局出发，将阜外医院的业务方向定位为心血管病的医、教、研。

从军队到地方，从结核病到心脏病，这样的跨越带来了人事方面的变动。黄宛、陈星正、陈在嘉等心内科专业人员从北京协和医院调来，原业务骨干18棵青松中，一些年纪大的，如朱贵卿、黄国俊难舍耕耘了几十年的专业，便离开了阜外医院。而年轻的，则被院长吴英恺看得死死的。

王凤连还记得，一次，朱贵卿派人来找吴英恺想要调回他原来的“四大

金刚”中的成员（罗慰慈、赵宗友、刘力生、罗秉坤），为其做助手。这让惜才的吴英恺勃然大怒，他拍着桌子说：“调助手？调谁？我去给朱大夫当助手！别的人不给。”他回过头看到恰巧坐在会议室的王凤连，立即“命令”道：“王凤连，哪儿也不能去！跳出来，跳出来！从肺调到心。”

就此，王凤连团队全部跟上步伐，从结核病逐步转向心脏移植免疫排斥研究，并承担了检验科的工作。

阜外医院成立的第二年，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，吴英恺主编了全国首部胸部疾病专著《胸部疾病》一书。王凤连参与了“结核病的



1989年，王凤连参加在法兰克福举办的第七届国际免疫学大会

细菌学和免疫学”等章节的编写。

王凤连还记得，参编书籍的那些日子真是一段心无旁骛的日子。为赶在“十一”国庆之前印出来，“书记把着门口，脚丫子蹬着墙，不让别人进，谁来也不让找”。



1998年，王凤连与陈可冀院士等人一起参加博士论文答辩

在检验方面，20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于没有现成的商业化试剂，各医院检验科均需手工配制，再加上操作不规范，

导致同一个患者在不同家医院检查结果大相径庭。

王凤连同学的一个妹妹，在体检时，被某医院抽血化验出“梅毒”呈阳性反应，另一医院的结果却是阴性。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“梅毒”两个字眼还是让这位年轻姑娘与梦想的出国留学机会失之交臂。后来，她开始状告医院。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。

为此，当时的北京市卫生局下决心要统一全市检验科操作规程。因阜外医院检验科多次在北京市操作竞赛中获得第一，实力有目共睹，任命王凤连为牵头人。

王凤连将北京多家重要医院检验科主任召集在一起，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，哪个医院哪几项检验项目比较拿手，就把规程写出来，全市按此统一操作。

“书是我们编的，但做工作很费劲。哪个医院的某个检验项目如果被刷掉了，得照着别人的方法做。”王凤连顶住压力，团结大家将这个硬骨头给

啃了下来，著成《细菌血清检验手册》一书，从此统一了全市的细菌血清检验规程。

主编有三位，虽为牵头人，但王凤连坚持将北京协和医院老技术员齐长才的名字放在了第一位。齐长才曾推脱说，自己只是一个技术员而已，但在王凤连心中，他是一个德高望重、知识渊博的前辈。齐长才在北京协和医院曾先后辅佐三位微生物免疫学系主任，被称为“活字典”。

“那时候没有说谁排第一，谁就升级快。大家不争这个。”王凤连说。

阜外医院自从以心血管病为科研、诊治作为方向以后，全院内科、外科、基础科通力合作，当时就表现出对心脏病有较好的诊治水平。但受“文革”的影响，科研工作中断，拉大了与国际间的距离。改革开放后，重组科研队伍，在心脏移植工作方面，主要研究心脏移植免疫排斥问题。王凤连带领研究生们与药物研究所合作，从中草药中筛选并提取冬虫夏草和雷公藤的有效成分，做抑制免疫的各项试验，取得初步成效。王凤连参与了天津医科大学内科郭仓教授主编的《内科基本功》，编写了风湿热及风湿性心脏病的免疫、心肌炎和扩张型心肌病、动脉粥样硬化、心肌梗死、高血压、心脏受损后综合征及血管炎的免疫问题，在心脏移植免疫方面总结了超急免疫排斥反应、急性排斥反应、慢性排斥反应，免疫排斥的防治及免疫抑制剂等章节。王凤连还联系国内10余个医科大学的微生物教研室同行合编《医用英汉免疫学词汇》，以便于统一名词术语，方便国际交流。王凤连总结的《中草药对机体免疫的调节（提高和抑制）作用》的论文，于1989年被邀请参加在柏林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免疫学术会交流。

现在国家十分重视科技发展，王凤连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阜外医院无论硬件还是年轻科研人员数量和能力都有提高，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，值得传承发扬的精神之一就是干劲足。工作要想做得好，大家就一定要协作好，不能争名夺利。只要大家团结合作，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。”

整理 / 宋攀